

## ※ 研究動態 ※

# 從「四書五經」到「四書三經」—— 對韓國經學研究的影響與展望

陳亦伶\*

經學的內容是中國文化思想的縮影，中國經學傳到鄰近各國後落地生根，影響東亞各國文化至深。古代典籍在東亞各國傳播的路徑是先由中國傳到朝鮮半島，再傳到日本，而日韓兩國皆受中國儒家文化深遠影響，也持續使用漢字，不似越南由法國殖民後，現今越南民眾已鮮少有人能讀漢喃文字。日韓兩國的語言結構相當類似，然而在臺灣學習日文的機構遠多於學習韓文的機構，語言的限制因素也影響學界研究方向。屏除以實用為導向的韓文系不論，人文學科中，自日本留學歸國的研究專家眾多，學界長期關注日本漢學並早有建樹，惟對韓國方面的研究目前仍未及日本方面豐沛。根據李明輝先生〈臺灣學界關於韓國儒學的研究概況〉<sup>1</sup>一文可知，現行文史哲學界中最早到韓國留學，且持續發表相關論著者為一九七一年畢業於成均館大學、現任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蔡茂松先生<sup>2</sup>，接著有臺灣大學黃俊傑先生從一九九八年開始的「東亞經典研究」，陸續帶領了李明輝、楊祖漢、陳昭瑛、林永勝、蔡振豐、林維杰等諸位先生從東亞儒學的觀點出發來關注韓國儒學，除此之外，中央研究院林月惠研究員亦長期關注中韓儒學比較研究，並有專著《異曲同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BK21 Plus Projec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Scholars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Korea University.

\* 陳亦伶，韓國高麗大學國語國文學系博士生。

<sup>1</sup> 李明輝：〈臺灣學界關於韓國儒學的研究概況〉，《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1期（2010年6月），頁259-277。

<sup>2</sup> 根據韓國 RISS 資料庫顯示其學位論文為《退栗 性理學的 比較研究：退栗의 사상 입장을 중심으로 하여（退溪與栗谷的性理學比較研究——以退溪與栗谷的思想立場為中心）》（漢城：成均館大學東洋哲學系博士論文，1971年）。

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sup>3</sup>。而上述先賢研究成果主要著重在儒學、史學方面。文學方面除了研究並開設相關課程，較顯著者有文化大學林明德先生、臺北大學王國良先生，皆側重於韓國漢文小說的範疇。然而韓國漢學研究中，不僅韓國儒學、韓國漢文小說值得關注，韓國經學與傳統中國經學、日本經學相較，有其朝鮮半島自行內化、融和當地社會文化形成的獨特之處，亦值得學界關注，本文將由此點切入，討論韓國經學研究的現況與內容。

## 一、前言：中國經學東傳至韓國的軌跡

在古代韓國<sup>4</sup>，從百濟時近肖古王(?-375)曾派博士王仁(生卒年不詳)至日本，並獻《論語》十卷及《千字文》一卷的紀錄來看<sup>5</sup>，中國經學至少在古代韓國之三國時代已先傳入朝鮮半島，再輾轉傳入日本。可見儒家思想與經學典籍流傳於三韓為時甚早，對照《舊唐書·東夷列傳》亦有相關記載：「百濟國，本亦扶餘之別種，嘗為馬韓故地……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sup>6</sup>此外從韓國古代的教育制度來看，三國時代的高句麗有太學、統一新羅時有國學、高麗時代有國子監，到了朝鮮時代則有書堂、鄉校及成均館等教育機構<sup>7</sup>。而關於經學教育，最早的紀錄為高句麗的小獸林王二年(372)時：「立太學、教子弟。」<sup>8</sup>到了百濟

<sup>3</sup> 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sup>4</sup> 現稱的韓國一般指的是1948年後相較於北朝鮮之南韓，為便於瞭解本文指涉的各時期國名，於此簡述綜合北韓與南韓的朝鮮半島歷代名稱如下：檀君朝鮮(2333 B.C.)→韓氏朝鮮(一稱箕子朝鮮)→衛滿朝鮮(195-108 B.C.)→三韓(馬韓-百濟-弁韓-伽倻-辰韓-新羅)(2-4 B.C.)→三國時代(百濟[18-663 B.C.]、新羅[57 B.C.-935]、高句麗[37 B.C.-668])→統一新羅(668-901)→王氏高麗(918-1392)→李氏朝鮮(1392-1897)→大韓帝國(1897-1910)→日帝占領時期(1910-1945)→大韓民國臨時政府(1919-1945)→美軍政時期(1945-1948)→大韓民國(即韓國、南韓，1948-)，而本文所指的古代韓國是包括現今北韓的整個朝鮮半島，若單稱韓國則為南韓。

<sup>5</sup> [朝鮮]韓致濬：〈藝文志·經籍〉，《海東釋史》(漢城：財團法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卷44，頁後56。

<sup>6</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328-5329。

<sup>7</sup> 成均館是朝鮮時代的最高學府，命名取自《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

<sup>8</sup> [高麗]金富軾：〈高句麗本紀〉，《三國史記》(漢城：財團法民族文化推進會，1973年)，卷18，頁140「小獸林王二年」條。

聖王十九年(541)時亦派遣使臣到中國請來《毛詩》博士<sup>9</sup>，此外中國史書《陳書》中亦有百濟請去禮學博士陸詡(生卒不詳)<sup>10</sup>的記載。在新羅時更明確地指出教育機構裏的教科書便是傳統中國經學——四書五經——中的《尚書》：「元年，大赦。幸太學，命博士講《尚書》義。」<sup>11</sup>接著還設立了「四書五經齋」<sup>12</sup>。到了高麗開國初期，高麗成宗(961-997)曾向宋太宗(939-997)請求輸入書籍，《宋史·高麗列傳》中便記載了當時賜與的書籍為九經、《唐史》與《冊府元龜》<sup>13</sup>。高麗後期安珣(1243-1306)將朱子學引入高麗後<sup>14</sup>，儒家思想在古代韓國紮根影響甚鉅，到了朝鮮時代更可說是朱子學的時代。除了學校教授經學，科舉考試亦會考經書內容，在在顯示古代韓國學術動向深受中國影響，從上文亦可知悉，至少到高麗朝四書五經的內容已完全傳入古代韓國。然而，現代韓國學者卻說韓國經學是「四書三經」，乃至與普羅大眾最貼近的大眾讀物、朝鮮時代歷史劇裏言及經學內容必稱「四書三經」，表示人們對經學的概念為「四書三經」，而非傳統中國經學中常言之「四書五經」或「十三經」，為何會有如此差異，下文將從史籍文獻中梳理經學傳到韓國後，從「四書五經」轉變為「四書三經」的過程，及其對韓國經學研究的影響。

<sup>9</sup> 金富軾：〈百濟本紀〉，同前註，卷26，頁195「聖王十九年」條：「王遣使入梁朝，貢兼表請《毛詩》博士、《涅槃》等經義并工匠、畫師等，從之。」

<sup>10</sup> [唐]姚思廉：〈儒林傳〉，《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442：「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

<sup>11</sup> 金富軾：〈新羅本紀〉，《三國史記》，卷9，頁83「惠恭王元年」條。

<sup>12</sup>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漢城：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卷74，頁628-629「學校」條：「〔恭愍王〕十六年，成均祭酒林樸上言，請改造成均館，命重營國學于崇文館舊址，令中外儒官，隨品出布，以助其費，增置生員，常養一百，始分五經四書齋。」這五經四書齋便是：論語齋、孟子齋、大學齋、中庸齋、詩經齋、書經齋、周易齋、禮記齋、春秋齋。

<sup>13</sup>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84，頁14042：「表求太宗御制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

<sup>14</sup> 鄭麟趾：〈諸臣安珣〉，《高麗史》，卷105，頁322-324：「安珣，初名裕，興州人，官至密直副使致仕。……付博士金文鼎等，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晚年，常掛晦庵先生真，以致景慕，遂號晦軒，蓄儒琴一張。」《高麗史》的這段紀錄顯示了安珣推動教育請人至中國訪求經史書籍，從其晚年掛置朱熹肖像來看，至少在此時朱子學說已傳入韓國。

## 二、科舉制度對經學學習意願的影響

三韓中的新羅實施一種用來掌控統制權與政治力的制度，稱為「骨品制」，是依血緣關係訂定階級，按血統確定身分等級與相應官階，因而影響出仕。新羅統一三國後繼續沿用，但是若能博通《五經》、史書則能超越骨品限制，獲得拔擢出仕，這種制度稱為「讀書三品科」<sup>15</sup>。主要是以考試科目的多寡來訂定品級，選考《曲禮》、《孝經》二科者，為下品；選考《曲禮》、《孝經》、《論語》三科者，為中品；選考《禮記》、《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文選》五科者，為上品；若是以《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書等為考試科目者則為特品。由此可看出當時對《五經》的重視，然而能以此法突破骨品制的人畢竟還是少數，由於新羅統一前的舊有真骨貴族（骨品制中的最高階級）的抵制，於是這些儒生們紛紛留學唐朝，以求藉由留學遣唐的權威和學問來彌補他們在骨品上的劣勢，崔致遠(857-?)便是其中最著名的留學生。

但九世紀末舊有貴族愈加腐敗，地方各部族興起反新羅的勢力（稱為「豪族」）趁機坐大，高麗太祖王建(877-943)雖統整了各地豪族擊敗新羅，然而王權並未鞏固，為求加強中央集權的王權威信，在高麗光宗(925-975)戊午九年(958)時，採取隨商船前往高麗的五代後周使臣雙冀(951-960)的建議，開始實施科舉制度拔擢人才<sup>16</sup>：

三國以前，未有科舉之法，高麗太祖首建學校，而科舉取士未遑焉。光宗用雙冀言以科舉選士，自此文風始興，大抵其法頗用唐制，其學校有國子、大學、四門，又有九齋學堂，而律、書、算學，皆肄國子；其科舉，有製述、明經二業，而醫、卜、地理、律、書、算、三《禮》、三《傳》、何論等雜業，各以其業試之。<sup>17</sup>

<sup>15</sup> 金富軾：《三國史記》，卷10，頁89「元聖王四年」條：「四年春，始定讀書三品以出身，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為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為中；讀《曲禮》、《孝經》者為下；若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書者，超擢用之。」

<sup>16</sup> 鄭麟趾：〈光宗世家〉，《高麗史》，卷2，頁61「戊午九年五月」條：「始置科舉，命翰林學士雙冀，取進士。」

<sup>17</sup> 鄭麟趾：〈選舉志·序〉，同前註，卷73，頁589。

又：

光宗九年五月，雙冀獻議始設科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兼取明經，醫、卜等業。十一年，只試詩、賦、頌。十五年，復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sup>18</sup>

由此可知高麗科舉仿照唐代科舉制度分為製述業、明經業、雜業三大類，從考試內容可得知製述業是偏向文學性的考科、明經業則是以經學為主，其餘醫藥、占卜、法律等則為雜業，然而有趣的是，這時三《禮》、三《傳》也歸入雜業。從報考各科的人數與通過考試的人數可以得知<sup>19</sup>，比起經學，高麗貴族（士族大夫）們更崇尚文學<sup>20</sup>。在高麗時代製述業比明經業更受重視的原因，除了上述新羅崔致遠等人遭唐留學回到高麗朝後，帶回在中國文學史上享譽盛名的唐人詩歌文作，深深吸引了麗代以降的讀書人；另一方面是明經業不像製述業定期舉行，而是每隔數年才舉行一次，因此高麗時代的科舉雖然分三類，但實際上是以製述業為主。

然而，即便是以詞章為主的製述業，也會考經書經義內容，製述業的考試得經過初、中、終三場考試，檢閱《高麗史·選舉志》可知高麗朝的製述業考試中，一開始並沒有考經學，穆宗七年(1004)開始有針對《禮》經的貼經<sup>21</sup>，睿宗十四年(1119)開始有「六經經義」的考題，這六經是指《詩經》、《書經》、《周易》、《禮記》、《春秋》、《周禮》。忠穆王(1337-1348)起到恭愍王(1330-1374)、辛禡王(1369-1389)時，初場考試的科目為「六經義」與「四書疑」<sup>22</sup>，由此《四書》才開始出現在古代韓國的科舉考試中，而在這之前高麗時代有關經學的科考內容主要是以

<sup>18</sup> 同前註，頁 589「設科舉」條。

<sup>19</sup> 高麗朝明經業合格者 449 名、製術業合格者 6188 名。

<sup>20</sup> 參曹佐鎬：《韓國科舉制度史研究》（漢城：범우사，1996 年），頁 38：「고려시대 전체를 통하여 252 회나 과거가 실시되어 6750 人の 등과자를 내었는데, 이 중 제술 출신이 5982 人인데 대하여 명경 출신은 448 人에 불과하였다. 이는 바로 고려 귀족들이 經學보다도 文學을 숭상하였다는 사실을 알려주는 것이다（以高麗時代所舉行之 252 回科舉考試整體來看，共錄取了 6750 名登科者，其中製述類有 5982 名、明經類有 448 名，這懸殊的差異正顯示出高麗時期的貴族們，比起經學更偏好文學的現象）。」

<sup>21</sup> 貼經是指隨意遮住經文的一部分，考生須默寫出被紙掩蓋之經文。

<sup>22</sup> 鄭麟趾：〈選舉志〉，《高麗史》，卷 73，頁 594「設科舉」條：「忠穆王即位之年八月，改定，初場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

《五經》為重，從出題的變遷便可瞭解經學各科目的消長<sup>23</sup>。

李成桂(1335-1408)滅高麗朝建立李氏朝鮮後，對於新的王朝、新的國家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拔擢人材，從《太祖實錄》「一三九二年」條之〈太祖即位教書〉<sup>24</sup>中可知，大抵還是沿用前朝制度，但更細分為大科、小科（一名司馬試或監試）、武科、雜科四大類別，大小科指的就是文科考試。由於太祖李成桂為了穩定社會擁絡高麗遺民，沿用高麗朝大部分制度，因此文科的考試一開始也是以製述為主。但是因為後來新增了「背誦講經」的考試方式，使得「製述」的概念有些許轉變，也就是說朝鮮朝的製述科與高麗朝的製述業概念有些差異，高麗朝的製述業指的是製述業、明經業、雜業三大考試類別中，偏向文學性考試的科目；而朝鮮朝的製述科則是文科、武科、雜科三大考試類別中，文科考試中的項目，這時的製述指的是筆

<sup>23</sup> 製述業出題科目變遷表

年代	初場	中場	終場
光宗 9 年 (958)	詩、賦	頌	時務策
光宗 11 年 (960)	詩	賦	頌
光宗 15 年 (964)	詩、賦	頌	時務策
成宗 6 年 (987)	詩	賦	時務策
穆宗 7 年 (1004)	貼經 (禮經十條)	詩、賦	時務策
顯宗元年 (1010)	貼經 (禮經十條)	詩	賦
顯宗 10 年 (1019)	貼經 (禮經十條)	詩	論 (禮記)
睿宗 5 年 (1110)	貼經 (禮經十條)	詩、賦	策
睿宗 14 年 (1119)	經義 (六經)	詩、賦	策
仁宗 5 年 (1127)	經義 (六經)	詩、賦	論
仁宗 14 年 (1136)	經義 (六經)	詩、賦	論
仁宗 17 年 (1139)	經義 (本經)	論、策	詩、賦
毅宗 8 年 (1154)	論、策	經義	詩、賦
忠肅王 7 年 (1320)	論、策	經義	策問
忠穆王即位年 (1344)	六經義、四書疑	古賦	策問
恭愍王 11 年 (1362)	六經義、四書疑	古賦	詩、賦
恭愍王 17 年 (1368)	詩賦	策問	經義
恭愍王 18 年 (1369)	詩賦	經義	對策
辛禑王 2 年 (1376)	經義	策問	詩、賦
辛禑王 12 年 (1386)	經義	詩、賦	策問
昌王即位年 (1388)	詩賦	策問	經義

轉引自許興植：《高麗科舉制度史研究》（漢城：一潮閣，1981年），頁94；池富一：《元明交替期朱子學の東傳と朝鮮初の鄉村教化（元明之際朱子學の東傳與朝鮮初期鄉村教化研究）》（漢城：慶熙大學博士論文，1992年），頁104。

<sup>24</sup> 《太祖實錄》，卷2，「1年7月28日丁未」條（本文所引實錄來源皆為《李朝實錄》，一稱《朝鮮王朝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之網路版，網址：<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下省略僅標明該實錄朝代名稱）。

試成分較高的一種考試方式，當然沿用前朝慣例，文學與經學內容都納入考試範圍。

朱子學導入後，《四書》的地位提高，文科考試科目在朝鮮朝進一步確立為「四書五經」，從太祖、太宗朝一直沿用直到世宗朝初期出現了變化。《世宗朝實錄》中指出士人不讀經書的缺失：

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近來式年科舉，只試製述。因此學者不務經學，專事詞〔章〕，其弊可慮。乞依《元典》及已行格例，其通四書三經以上者，背講試取。」從之。<sup>25</sup>

由於文科考試中，經學的比重並不多，因此讀書人多不讀經書，世宗李裲(1397-1450)為了提振經學的研讀風氣，於是在成均館與各地鄉校開設基本講經課程。世宗二十四年(1442)十月時，將文科的初場考試由製述改為講經，特別強調經書的比重<sup>26</sup>，到了世祖六年(1460)更開始定期實施明經科考試，而朝鮮時代特有的「背誦講經」式<sup>27</sup>的考試內容也影響到儒者讀經的意願。

高麗到朝鮮舉行的經書考試中分為「講經」與「疑·義」，簡單來講就是前者為口試，後者為筆試。一開始朝鮮朝的文科初試是考筆試之「疑·義」，複試為口試之「講經」，但由於「講經」的口試方式為考官與考生彼此面對面進行考試，不公平之處在所難免，因此曾出現過爭論。原本較認同「疑·義」筆試公平性的世宗，於考試制度實施二十年後，發現「疑·義」的考試方式無法帶動讀書人對經學的關注，才又改回講經。在世宗二十四年時則確立了「背誦講經」的考試方式，《世宗實錄》「二十五年」條中也詳細記載關於「科舉講經程式」的計分方式與實施要點。「背誦講經」進行的方式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隨意抽背經書內容，另一部分則是考生與主考官之間對經義的理解問答，為了解決「面對人情之弊」，更於世宗三十一年(1449)開始實施「隔帳法」，在考生與主考官間加一布簾阻隔。世宗朝一開始是四書五經都考的，但由於經書內容太難，便出現可以選擇性僅考「四書四經」或「四書三經」的內容，會有這樣的變革主要是為了減輕儒生的負擔，並鼓勵

<sup>25</sup> 《世宗實錄》，卷 98，「24 年 10 月辛亥」條。

<sup>26</sup> 同前註，卷 102，「25 年 12 月癸未」條中更明確指出科舉考試中講經的方式及評分細則。

<sup>27</sup> 由朝鮮時代儒者李學遠《洛下生集》中提及：「明經科，中國用帖括，我國取背誦。」可知朝鮮朝的明經科取士方式與中國迥異。《洛下生集》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漢城：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年），第 290 冊，頁 605。

精讀經書內容，求專經不求龐雜。由於受朱子學的影響，《四書》是基本必考指定科目，其他三經一般是考《詩經》、《尚書》與《周易》，但由於《周易》的內容理解起來比較困難，也不容易背誦，所以從成宗朝開始《周易》考科分數可以加倍<sup>28</sup>，到了孝宗六年(1655)時，如果選考《春秋》也可以加分<sup>29</sup>。世宗為了振興經學而進行的「背誦講經」與選擇性考四書三經的科舉改革方式，一直實施到朝鮮時代科舉廢止(1894)為止，沿用了約四百五十年，也就是說朝鮮建國初期講經科目原本是考「四書五經(九經)」，先改成七書後，之後又改成「四書三經」<sup>30</sup>，這樣的科考制度影響士大夫讀書的意願與著書方向，多集中在《四書》與《詩經》、《書經》、《周易》三經，或加上後來可以加倍計分的《春秋》。

### 三、借字表音與諺解本的影響

韓國的經學除了因為朝鮮時代科舉考試的關係，而從四書五經改為四書三經外，與諺解工作也有密切的關係。

日韓文都是黏著語，黏著語的特徵就是在名詞、動詞等後面黏上不同的詞尾來表達語法意義，語法特色是 SOV，即主語在前、賓語在中、謂語在後。韓文的文

<sup>28</sup> 《中宗實錄》，卷2，「2年2月27日」條：「今別試，於三經，抽一經試之，而《周易》獨倍畫，甚為不均。請罷倍畫之法。傳曰：《周易》倍畫之法，成宗豈不詳度，而為之乎？仍舊可也。」  
<sup>29</sup> [朝鮮]徐宗玉等撰：〈禮典〉，《續大典》(漢城：首爾大學奎章閣，1998年)，頁202-203：「式年文科覆試，初場四書三經背誦，願講《春秋》者聽《周易》、《春秋》倍畫。」

<sup>30</sup> 朝鮮朝太祖至世宗期間文科初場經書理解考試方式與科目變化表

日期	考試方式與科目	提倡者
太祖1年(1392)7月	背誦講經(四書五經)	鄭道傳
太祖2年(1393)	製述	趙浚
太祖4年(1395)	講經(四書五經)	鄭道傳
太宗7年(1407)3月	製述(四書疑一問、五經義一問)	權近
太宗17年(1417)閏5月	臨文講經(七書)	許遲等
世宗7年(1461)10月	製述(四書疑一問、五經義一問)	卞季良、鄭招、權軫、安純
世宗8年(1462)	初試疑、義(四書五經)	申叔舟
世宗10年(1428)4月	疑、義(四書五經)	卞季良
世宗11年(1465)	覆試背誦講經(四書三經以上)	申叔舟
世宗25年(1443)	背誦講經(四書三經以上)	

參自曹佐鎬：《韓國科舉制度史研究》，頁152；정지연：《조선 초기 文科講經科目的 변화 고찰(朝鮮初期文科講經科目的變化考察)》(忠清：韓國教員大學教育哲學與教育史專業碩士論文，2010年)，頁78。



法語順與中文完全相反，在進行口譯時須聽到最後一個單字才能翻譯出整句話的意思。因此，古代韓國人民日常用語會話與當時使用的書面文字（漢字）截然不同，在韓文（한글, Hangeul）發明以前，為了能記錄人們的口說文獻，發明了很多用漢字來使口說語言文字化的借字表記方式，因而有「誓記式」<sup>31</sup>、「鄉札」<sup>32</sup>、「吏讀」<sup>33</sup>、「口訣」<sup>34</sup>、「諺解」跟「懸吐」<sup>35</sup>的發明，而這些方式後來也用來幫助讀書人瞭解經書的內容。這些以漢字表音作記的語言方法中，「口訣」、「諺解」跟「懸吐」是在世宗發明訓民正音後使用訓民正音輔助的表音方法，其餘皆是於訓民正音發明前便有的借字表音文字，是借用漢字的形音義來當作韓文的助詞。以一句《論語·學而篇》的經文為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為了幫助朝鮮時代讀書人瞭解這段漢字的意思是：

學得新知並常常溫習的話，不是很愉快的嗎？（是很愉快的呀）

<sup>31</sup> 誓記式漢文源自 1934 年，出土於韓國慶尚北道慶州市的一塊新羅時期「以王申誓記石」碑文，原文為：「王申年六月十六日，二人并誓記，天前誓：今自三年以後，忠道執持，過失無，誓。若此事失，天大罪得，誓。若國不安大亂世，可容行，誓之，又別先辛末年，七月二十日，大誓，《詩》、《尚書》、《禮》傳倫得，誓三年。」這段碑文雖然通篇用漢文刻成，然而語順卻與漢語有別，是 SOV（主詞、受詞、動詞）語法的韓國式漢文，例如碑文中的「忠道執持」、「過失無」若換成現代漢語的語法應為「執持忠道」、「無過失」等，這是目前發掘最早的古代韓國借字表音的文獻史料。

<sup>32</sup> 鄉札又稱鄉歌，現僅存二十九首，韓國文學史中現存最早的新羅鄉歌「薯童謠」，就是其中的一首借漢字的音和漢字的意思表記下來的作品，原文為：「善花公主主隱，他密只嫁良置古。薯童房乙，夜矣卯乙抱遣去如。」雖然全部都是漢字，但隱含了借字表音，使用漢字音讀來表示韓文虛詞、漢字訓讀來表示實詞。

<sup>33</sup> 이두（吏讀）或稱吏頭、吏道、吏刀、吏吐、吏書、吏套，是以漢字表記韓語一種方法。相傳吏讀為新羅人薛聰（生卒年不詳）所創，三國時代開始使用，直至西元十九世紀末，然而並沒有明確的文獻史料可以證實確為薛聰所創，只能確定在薛聰時進行一定程度的整理。

<sup>34</sup> 口訣（구결 或稱 입결），是用於表示加注於漢文的朝鮮語助詞的韓語文字。口訣用於記錄注於漢文中各短語間的韓語助詞，以便於文章的閱讀與解釋。口訣依據發展年代的不同有時代上的差異，不同學派所註解的口訣也有若干差異。為了解讀大量的口訣文獻，韓國現有「口訣學會」，定期舉辦研討會並發行學術期刊，相關資料可參照口訣學會網頁，網址：<http://www.ikugyol.or.kr/>。

<sup>35</sup> 諺解跟懸吐都是在漢文的句子中間插入韓文助詞和語尾，協助理解漢文文義的一種方法，表現的方式如：「曾子曰慎終追遠이면 民德이歸厚矣리라。」

於是用韓文標示的助詞便成為：

子曰：學而時習之면不亦說乎아。

但是當時還沒有韓文，無法用韓文表達口語中的면跟아，所以就用發音相近的漢字「面」來表示「면」、「雅」來表示「아」，再簡化成用類似「丁」的符號代替「面」字面上的部分、「牙」代替「雅」的左邊，因此吏讀本上這一段的經文就會寫成：

子曰：學而時習之丁不亦說乎牙。

這是比較常見且較簡單的經文，所以一看就知道哪些部分是借字表音的吏讀文，但若是像《尚書》中詰屈聱牙又艱澀難懂的經文與吏讀文字合在一起，不瞭解吏讀者就很容易誤解原義。

在訓民正音發明前不得已使用借字表音的方式來理解經義，訓民正音發明後，為了能直接用日常說話習慣的韓文方式來解釋、翻譯漢文書籍內容，於是便出現了「諺解」。但不同的註解者，其閱讀漢文理解的方向跟意思的差異，所作出來的諺解文也會有所差異。而諺解之所以會影響經學的研究，還是與科舉取士有密切的關係。

明代的《四書五經大全》編纂完成四年後便傳入朝鮮<sup>36</sup>，朝鮮時代因遵奉朱子學說為圭臬，自然也將《四書五經大全》視為問學的重要典籍，宣祖時受了《四書五經大全》的影響，覺得為了便於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應有一個明確的本子可以研讀背誦，因此於宣祖十八至二十一年(1585-1588)時刊定了《校正廳本四書三經諺解》，這不但影響了往後朝鮮儒者注經解經的範圍多局限在四書三經的範疇，也影響了現今韓國經學研究的內容集中在四書三經。

#### 四、朱子學獨大的影響

前文提及，由於科考與《校正廳本四書三經諺解》的諺解工作，影響士大夫讀書的內容多局限在《四書》與《周易》、《尚書》、《詩經》中，也影響了著書風氣，從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於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八年間編纂的《韓國經學資料集

<sup>36</sup> 《世宗實錄》，卷 69，「17 年 8 月癸亥」條：「太宗皇帝朝，撰集《四書五經大全》等書久矣。本國初不得聞，逮至庚子，敬寧君附京受賜，其後累蒙欽賜。」這裏的庚子年指的是世宗元年，而《四書五經大全》完書於永樂十三年，因此完刊後四年便傳到朝鮮。

成》中編排的方式便可窺見端倪。眾所周知，傳統中國經學的順序為：《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但是《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的排列方式卻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書經》、《周易》、《禮記》、《春秋》。這顯示諺解工作影響到讀書人著書多集中在《四書》與三經的內容，三《傳》中的《春秋》會突出，應與前文提及的孝宗六年(1655)時的科舉政策有關，另外一項最主要的因素，便是遵奉朱子學說的影響。

朝鮮時代是朱子學的時代，這樣的觀念是現代韓國學者普遍的想法，朝鮮儒者張維(1587-1638)曾批判過朱子學獨大的情況：

中國學術多岐，有正學焉，有禪學焉，有丹學焉，有學程朱者、學陸氏者、門徑不一。而我國則無論有識無識，挾筴讀書者，皆稱誦程朱，未聞有他學焉。豈我國士習果賢於中國耶？曰非然也。中國有學者，我國無學者。蓋中國人材志趣，頗不碌碌，時有有志之士，以實心向學，故隨其所好而所學不同，然往往各有實得。我國則不然，齷齪拘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不唯無所謂雜學者，亦何嘗有得於正學也。譬猶墾土播種，有秀有實而後五穀與稊稗可別也，茫然赤地之上，孰為五穀，孰為稊稗者哉。<sup>37</sup>

張維批判朝鮮時代過度遵從朱子學說的單一化學風問題。而在明代被視為對朱子學反動的陽明學雖然也傳到朝鮮，但由於朱子學獨大的原因，當時曾被嚴厲地抵制，王學相關書籍也被列為禁書，韓國學術界一直到七〇年代才興起研究陽明學的風潮。此外，言必程朱的情形也體現在文廟配享的牌位上，中間為孔子牌位與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五聖，五聖左右兩旁是孔門十哲，孔門十哲下面便是宋朝六賢（周敦頤、邵雍、二程、張載、朱熹），再外圍才是韓國十八賢（薛聰、安珣、金宏弼、趙光祖、李滉、李珣、金長生、金集、宋浚吉、崔致遠、鄭夢周、鄭汝昌、李彥迪、金麟厚、成渾、趙憲、宋時烈、朴世采），不只成均館大成殿如此，一般地方的鄉校中也都是如此設置。而在祭祀的祭拜禮法上，中國的祭禮是採用清朝特有的「三九拜」禮，而韓國則是以《朱子家禮》中記載的「四拜」禮為主，應該說

<sup>37</sup> [朝鮮] 張維：〈我國學風硬直〉，《谿谷集》，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90冊，頁605。

古代朝鮮的冠、婚、喪、祭禮全都受了《朱子家禮》的影響，因而《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的《禮記》部分也大都是與《朱子家禮》相關的著作。又，韓國學者認為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裏《大學》與《中庸》的部分花了數十年的時間不斷地反覆刪修增定，甚至到了朱熹臨終前三天還在校改《大學章句集註》的內容看來，《大學》為朱子學說的核心一點也不為過，《大學》是《四書》的中心思想，因此若要瞭解朱子學說，必得對《大學》下功夫深究<sup>38</sup>，因而《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編排是以《大學》為首。不僅朝鮮時代著書以朱子學為中心，現今韓國學術界文史哲方面與朱子學相關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棟。

## 五、現行韓國教育體制下的經學研究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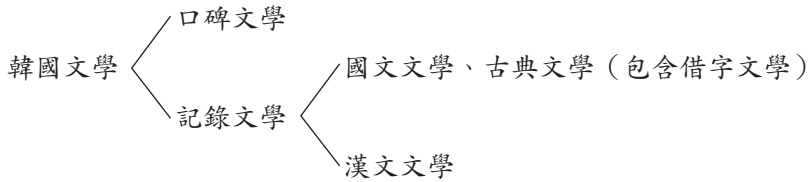
崔錫起先生曾於〈韓國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中指出：「經學在現代學科體系中開始進行研究不過是近三十年的事。」<sup>39</sup> 研究韓國經學的起步會如此晚，部分韓國學者認為跟日本侵略有關，當時不少人認為因為朝鮮時代太注重相對保守的儒學精神，因而無法抵抗相對進步且西化的日本侵略，因而從日治獨立後的現代韓國，轉往關注實學研究者甚多。但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與現行的韓國教育體制與文獻整理較晚有關。

在韓國，經學是漢文學的領域。在臺灣，除了中文系學生會寫經學研究相關論文外，文史哲相關科系每年也都有經學研究的學位論文產生；而在韓國會接觸經學並撰寫經學論文的科系大都與「漢文」有關，如漢文學專業（或國語文學系中的漢文學組）、漢文教育專業以及古典翻譯協同專業，而東洋史學與東洋哲學專業偶爾也會有幾篇相關論文產生。這是由於現代韓國的經學教育沒被歸入中文系的緣故。在這裏必須說明，韓國大學中的國語國文學系、中國語文學系與漢文學系的差異，國語國文學系即如同臺灣的韓國語文學系，舉凡韓國的語言文字、古典文學、現代文學、韓文教育、對外韓語教育等皆包含在此科系中。而中國語文學系則是教授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系所，其性質就如同臺灣的日文系、俄文系、阿拉伯文系一般，

<sup>38</sup> 崔錫起：〈序言〉，《朝鮮時代大學圖說》（首爾：보고사，2012年）。

<sup>39</sup> 崔錫起：〈韓國經學 研究의 回顧와 展望（韓國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大東漢文學》第19輯（2003年），頁162：「경학이 현대학문 체계에서 연구되기 시작한 것은 불과 30년 정도밖에 되지 않는다（經學在現代學科體系中開始進行研究不過是近三十年的事）。」

主要還是偏重語學實用的功能，因此一般是不太會教授經書科目；在國語國文系中的漢文學組、漢文學科，抑或漢文教育科才會教授經學科目。而漢文學系則是處在一個尷尬的地帶，剛好介於這兩個科系的中間。有關韓國漢學的範疇可以下表說明<sup>40</sup>：



漢文學系學習的內容是古代韓國及朝鮮時代的古代儒者所寫的漢文學、漢詩、經學相關內容，文體的來源與中國語文系所學的相重疊，文本內容又屬於國語國文系的古典文學，因此造成領域過於專業，以致到了研究所階段，有漢文學專業的大學院（研究所）不多<sup>41</sup>，大大縮減了這方面升學的學生數。因此韓國的經學教育情況與臺灣迥異，臺灣幾乎每個大學都有中（國）文系所，四書五經的內容在大學中文系便會學習，培養出來的研究者也多，但韓國社會的經學教育不在中文系而是在漢文系，漢文系的數量遠不如實用為主的中文系，也就無法培養大量的人才研究經學。依據金慶天先生〈韓國經學研究的現況與課題〉<sup>42</sup>一文可知，韓國最早的一篇有關經學的學位論文為一九五二年首爾大學中文學科碩士張深鉉的《詩經章句法研究》，然而這是關於中國經學的研究。最早一篇關於韓國經學的研究論文為李乙浩〈關於丁茶山的易理研究〉<sup>43</sup>，而韓國學術界最早舉辦的經學研討會則是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三、十四日，於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所舉行的「韓中日三國經學（17-19世紀）發展的意義與性格」研討會<sup>44</sup>。

除了教育體制影響經學研究人才的數量外，韓國經學研究會起步如此之晚，也

<sup>40</sup> 此表引自金興圭：《韓國文化의 이해（韓國文化的理解）》（首爾：민음사，2011年），頁22。

<sup>41</sup> 漢文學系學生畢業後，若繼續升學，以韓國首都首爾為例，僅有高麗大學與成均館大學設有漢文學專業研究所。有關韓國各大學漢文學系、漢文教育系設置校數等相關詳細中文資料，請參考沈慶昊著，金培懿譯：〈韓國漢學（中國學、韓國漢文古典學）研究的現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1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94-201。

<sup>42</sup> 轉引自金慶天：〈韓國에 있어서 經學研究의 現況과 課題（韓國經學研究中的現況與課題）〉，《中國學報》第38輯（1998年），頁314。

<sup>43</sup> 收入全南大學校編：《論文集》第2輯（1958年）。

<sup>44</sup> 金慶天：〈韓國에 있어서 經學研究의 現況과 課題〉，頁316。

與文獻的整理有關，從崔錫起先生的〈韓國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sup>45</sup>一文列舉的三一五條韓國經學研究相關論文資料不難發現，韓國的經學研究是在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於一九九八年出版《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後才開始嶄露頭角。雖然在這之前也有不少經學研究相關論文出現，但多是以中國經學家為對象的研究，純粹以韓國李朝時代儒者的經學著述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主要還是在《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出版後才顯著增加。也就是說韓國在此之前，因為沒有像清朝《四庫全書》般的叢書出現，因而研究者無法知道自己國家有關經學的史料文獻有哪些，研究對象星散各處，無法達到文獻足徵，因此經學研究起步較晚。

李聆昊先生曾於〈朝鮮論語學的形成與展開樣相〉文中指出：「與朝鮮時代龐大的經學史料文獻和研究的時間相比，研究範疇並不寬廣。」<sup>46</sup>現今韓國經學研究的現況，誠如前文所及，因朱子學獨大，《四書集註》的影響甚高，研究內容偏重在《四書》上，在《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出版前，關於韓國經學的研究論文多側重幾位大家，如李滉(1501-1570)、李瀾(1681-1763)、丁若鏞(1762-1836)等。直到《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共145冊、收書1253種)出版，才為韓國經學研究開啟一個嶄新視野，也立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 六、未來研究展望

綜如前述，韓國經學因其歷史文化背景因素，從傳統《十三經》縮小為「四書三經」，又因語言的隔閡與文獻未經整理等原因，研究起步較晚。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過後，經濟趨於穩定，各大財團紛紛支持人文領域的研究與文獻整理工作的進行，各種「定本式」的文獻整理、漢文翻譯工作陸續進行。於此，未來可以下列四方面關注韓國經學的研究。

<sup>45</sup> 崔錫起：〈韓國經學研究的回顧와 展望〉，頁190-211。

<sup>46</sup> 李聆昊：〈朝鮮論語學的形成與展開樣相〉，《지하의 논어, 지상의 논어 (地下的論語, 地上的論語)》(首爾：成均館大學出版部，2012年)，頁309：「조선시대 경학은 그 방대한 자료와 연구의 기간에 비해 연구의 범위는 넓지 않다 (與朝鮮時代龐大的經學史料文獻和研究的時間相比，研究範疇並不寬廣)。」

### （一）學派性研究

中國經學的歷史橫跨數千年，研究斷限多以朝代區分，然而韓國經學由於其社會文化的特點，多以學派為重。朝鮮時代社會的組織單位是家族，家族與家學密不可分，以家學形成的學派也往往擴大為黨派，與政治息息相關，例如顯宗朝(1660-1674)的乙亥禮頌問題中，宋時烈(1607-1689)與尹鑰(1617-1680)等人的激烈論爭，不僅僅是單純的禮學問題，其背後還有著西人與南人的政治角力。又，以屬於少論派的鄭齊斗(1649-1736)，因失勢於老論派，退隱江華島，後來形成韓國著名的江華陽明學派。以及朝鮮末期北學派學者朴齊家(1750-1805)、朴趾源(1737-1805)、金正喜(1786-1856)等人因能隨著使團前往清朝，與樸學大師翁方綱(1733-1818)、阮元(1764-1849)、孫星衍(1753-1818)等人交遊，形成朝鮮後期唯一的考據學派等。因此，以學派為主的經學研究是韓國經學的特點，若能與鄰近各國同時期、類似學風一同比較，將能更完善地瞭解中國典籍在古代傳播的面貌。

### （二）圖說研究

「圖說」是為了解釋經義而做的簡要說明圖，在中國學術史中由來已久，如著名的周敦頤(1017-1073)《太極圖說》、毛奇齡(1623-1716)《大學知本圖說》等。前文提及，由於語言的差異，古代韓國發展出借字表音的方式來幫助理解經書外，為了解釋經義而做的簡要說明圖，也是一種方式。宋代學者程復心(1256-1340)的《四書章圖》傳到古代韓國後，也對麗代以降朝鮮學者影響甚鉅，從高麗時代的權近(1352-1409)之《入學圖說》到日本侵略時期、美軍政時期後的金梲(1896-1978)之「第九大學圖·大學經傳新圖」，前後六百多年的時間，圖說之量相當驚人，崔錫起所編之《朝鮮時代大學圖說》、《朝鮮時代中庸圖說》共收入超過百位儒者的大學圖說三二六篇、中庸圖說一四七篇，計四七三篇，龐大的圖說文獻為韓國經學的特色之一，若能針對細部做比較，亦值得探究。

### （三）文獻學研究與海外孤本的發掘

元代馬端臨(1254-1323)曾於《文獻通考》序云：「漢、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書》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

隋唐亦復如是。」<sup>47</sup> 中國古籍浩如煙海，歷經朝代更迭，單是風吹、日曝、水浸、祝融、魚蠹等天災都使古籍難以保存，更遑論政治因素產生的兵火侵焚、社會風氣改變、思想變遷等人禍，在在都使古籍面臨難以補救的散亡佚之痛。所幸透過文獻的整理工作，如輯佚能還原古籍面貌。梁啟超(1873-1929)曾為此事大大讚揚清儒一番：「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墜，則國民之遺產損焉……雖復片鱗碎羽，而受賜則既多矣。」<sup>48</sup> 現代古籍整理工作因有古籍數位化與出土文獻之助，較清人便利許多，若能再利用韓國古代文獻，如《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收錄的龐大著書，相信更可整理出不少可貴史料，例如《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詩經》第七冊收錄的申綽(1760-1828)所著〈逸詩〉中，比中國歷代輯佚家多輯出〈勅誓詩〉與〈命射詩〉，以及從《大戴禮》、《淮南子》、《史記》多輯出三條資料，這都是以前所未曾發掘的。

過去曾在日本發掘過不少海外孤本<sup>49</sup>，中國南通大學張祝平教授於二〇一一年發掘原本記載於《四庫全書存目》中已經佚失的《經學隊仗》，原來一直保存於韓國中央圖書館，崔致遠之孫誤以為此書為祖上所撰，以崔致遠撰《類說經學隊仗》之姿刊印，得以流傳至今，經過張教授的比對與考證，才知此書實為中國古代學者朱景元（生卒年不詳）所纂之《經學隊仗》<sup>50</sup>。如前所述，中國典籍的流傳是先從中國到韓國，才再經由韓國流傳到日本，日本由於文獻整理工作起步較早，書志學也相當發達，因而發掘不少海外孤本，相信在韓國應該也能找到類似《經學隊仗》的古籍。

<sup>47</sup>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5年），第1冊，頁8。

<sup>48</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61。

<sup>49</sup> 近期如林慶彰校訂，葉純芳、橋本秀美編輯之《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書中揭示朱熹弟子黃榦、黃榦弟子楊復兩人對《儀禮經傳通解》祭禮部分所做的增補，對整個朱子禮學研究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尤其是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孤本，更可填補朱子禮學的完整性。然而此書一直不為世人所知，直到葉純芳、橋本秀美兩位先生經過數年抄錄點校出版後，中文學界研究者才得以一窺堂奧。兩位先生亦於該書中言及，目前在臺灣、中國及日本皆無法再尋獲楊復祭禮後面部分內容，中國古代書籍流傳到海外的路徑一般是先到韓國再傳往日本，因此兩位先生認為或許在韓國能找到這部分內容。

<sup>50</sup> 有關《經學隊仗》的相關內容請參閱張祝平：〈韓國藏本《經學隊仗》述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4期，頁99-104。



#### （四）儀軌以外的禮學研究

韓國是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中，保存古代禮儀最完善的國家。原因在於朱子學說傳入韓國後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儒教治國的朝鮮，由於對朱子的尊敬，所有古代禮學中特別是《朱子家禮》所規定的冠禮、婚禮、祭禮、喪禮，幾乎完整地保留下來，直到現在還遵循著。韓國晉州慶尚大學漢文學系直到現在仍於每年五月幫學生舉辦傳統冠禮。韓國禮書中的冠、婚、喪、祭四禮與史書、文集的禮訟，保存不少重要禮學相關文獻史料。然而，禮學文獻星散各地，韓國研究禮學的專家學者經過十年的辛勤蒐集，編成《韓國禮學叢書》，由釜山慶星大學韓國學研究所編輯出版。此出版計畫原始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但因資料內容過於龐大，歷經了十年的文獻整理工作後，才於二〇〇八年先出版十八世紀以前的韓國禮學書籍，第一次出版時僅出版第一至四部，共六十冊；第二次於二〇一一年七月出版十八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的禮書內容，為第五至九部，共六十二冊與補遺十六冊，總計一三八冊共一七八種韓國禮學圖書。目前刊印的一三八冊內容主要是圍繞在冠、婚、祭、喪禮的內容，可細分為：行禮規範類、家禮註釋類、綜合考證類、禮說論辯類、告祝文類與笏記類等。《韓國禮學叢書》〈發刊詞〉中提到在編輯過程中遍尋韓國各大圖書館館藏禮學相關文獻，資料出乎意外地多，整理起來也相當辛苦，因此目前僅先將整理好的「家禮編」刊印，未來將持續蒐羅文獻，並整理目前已收集的資料刊印「鄉禮」、「學（校）禮」、「邦禮」等其他韓國禮學相關資料續編。

在禮學研究上，過去韓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在朝鮮王朝儀軌上孜孜不倦地進行研究且有建樹，然而相較於國家禮儀的吉、嘉、賓、軍、凶五禮，與朝鮮人民生活更貼切的《朱子家禮》冠、婚、祭、喪四禮，更具有研究意義與價值。過去關於韓國禮學資料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現存既有之《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禮記》十冊與《韓國禮學叢書》一三八冊的出版，文獻方面的工作既已完備，便可開始進行細緻地專門研究，應會有可觀的成果展現。

### 七、結 語

綜如前述，科舉取士與諺解本的關係，影響了朝鮮時代經學研究的內容從中國傳統《十三經》的範疇縮小為以四書三經為中心的走向。但由於朱子學說傳入古

代韓國後蔚為風行，朱子《四書集註》對朝鮮學者的影響甚大，因而四書三經的經學研究中又特別著重在《四書》。因此，我們可以說韓國古代的經學研究是圍繞著科舉考試而發展的，並一直影響到現代的韓國經學研究現況，而對《爾雅》、《孝經》、《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等書不太重視。因此韓國經學的內容，更或精確地說，朝鮮時代的經學著重在「四書三經」而非「四書五經」，在這樣社會文化下的科舉考試因素影響了讀書人著書的風氣與對經籍注疏的意願，也影響了文獻聚散流通的內容<sup>51</sup>。過去因不瞭解而無法探究，但《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與《韓國禮學叢書》既已出版，若能開始研究韓國經學，乃至與鄰近日本經學相結合，以中日韓三國經學共同比較，將能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古代中國典籍在整個東亞的傳衍，也使經學研究將更臻完善。

<sup>51</sup> 現存朝鮮時代文獻史料中，對中國學術思想典籍進行注疏的著作，大多集中在四書與三經的內容，而對諸子思想中莊子的典籍進行注疏的，現存僅有朴世堂(1629-1703)的《南華真經註解刪補》一部，可窺出科舉考試對朝鮮時代著書影響之大。